

清朝的民族政策(蒙古、新疆、西藏部份)

張瑞威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在清帝國擴張的過程中，最棘手是那些自稱蒙古人的部落。其實女真統治者並非缺乏統治蒙古人的經驗，例如 1593 年，當努兒哈赤擊敗由海西葉赫部女真為首九個部落的進攻後，九部之一的科爾沁部蒙古歸降。隨著努兒哈赤的軍事擴張，愈來愈多居住在建州附近的蒙古部落像科爾沁部蒙古一樣融入了努兒哈赤的政權之內，不少蒙古騎兵更成為了八旗兵的輔助部隊。

不過蒙古部落非常分散，努兒哈赤所吞併的只是居住於遼東的少部份。東到吉林，西至賀蘭山，南臨長城，仍然有許多蒙古部落未被征服。這些在西面的蒙古部落中，最強大的是察哈爾部(Chahar Mongol)，首領林丹汗，自稱元朝宗室後裔。在努兒哈赤建立金朝後，林丹汗與明朝有協約，共同抵禦金。

對於皇太極來說，察哈爾部積弱已久，要在軍事上打敗他並不困難，困難在於如何在勝利後在察哈爾部地區建立一種合理的統治模式。林丹汗在察哈爾部的崇高地位，並不全來自軍事勢力，還有一個宗教的原因，就是「轉輪聖王」。蒙古大帝國自忽必烈(元世祖)開始，蒙古人由原來的撒滿教逐漸改信來自西藏的喇嘛教(俗稱紅教)，而紅教其中一個理論是「轉輪聖王」(Cakravartin)的輪迴轉世說。「轉輪聖王」是佛教的護法聖王，是世俗佛國間的汗王之王。在佛教經典中，第一位「轉輪聖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阿育王死後，「轉輪聖王」不斷輪迴轉世。自此，「轉輪聖王」便成為統治中亞佛教地區合理的身份，而在中亞的歷史上，唐太宗、成吉思汗、忽必烈均具有這種身份。林丹汗利用了這學說，使他成為繼承忽必烈而來的「轉輪聖王」，這使他對統治長城以北的草原具備了充份的理據。

1632 年皇太極親率軍隊攻打察哈爾部，林丹汗敗遁，1634 年病死於青海。1635 年，皇太極再派遣多爾袞攻打察哈爾部，最後消滅林丹汗殘部，俘虜了林丹汗的正妃和兒子，並得元朝傳國寶。皇太極將察哈爾蒙古連同以前歸順的蒙古人，組成了「八旗蒙古」，除增強清朝的軍事勢力外，也便於控制。

皇太極要有效地統治察哈爾蒙古，便須要向蒙古人表示自己也是繼承忽必烈而來的「轉輪聖王」。1636 年，原由林丹汗統治的 16 個蒙古部落在清朝的盛京召開大會，共尊皇太極為可汗。從此，紅教喇嘛廟也開始遍佈盛京。皇太極扮演「轉輪聖王」很成功，1638 年，在今外蒙古地區有三個(土謝圖部、扎薩克圖部、車臣部)自

稱元朝宗室後裔的喀爾喀蒙古聯盟(Khalkha Mongol)也主動願意歸順清朝，清廷規定這三部須每年各貢一頭白駝、八頭白馬，謂之「九白之貢」。

清廷最難應付的是分佈於今天新疆省(1884 年建省)的部落，這些部落從來沒有認同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後裔，也沒有說過自己是蒙古人；他們之中有小部份信奉伊斯蘭教，但大多是西藏的新興喇嘛教「格魯巴」(俗稱黃教)。因為這兩個因素，使皇太極及後來的清帝，雖自稱繼承了成吉思汗、忽必烈以來的「轉輪聖王」地位，對之亦無可奈何。

在清康熙年間，今新疆省天山以北的準噶爾盆地的佛教部落已出現了由四個部落(準噶爾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土爾扈特部) 組成的厄魯特聯盟(Oyirods)，其中以居住於伊犁河流域的準噶爾部為最強大。一直以來，準噶爾部與沙俄保持友好關係，對清廷非常敵視，當時準噶爾部的首領是巴圖爾洪台吉，為了利用黃教來增強自己的地位，派遣了兒子噶爾丹往西藏接受教育並且成為喇嘛。

1655 年左右，巴圖爾洪台吉死，噶爾丹從西藏返回準噶爾部，大肆擴張勢力。在噶爾丹的統治下，準噶爾部從天山北路擴張至天山南路，隨即向東發展，威脅向清朝進行「九白之貢」的喀爾喀蒙古。噶爾丹每次入侵，均聯絡東北沙俄，令清廷在軍事部署上投鼠忌器；加上康熙皇帝正忙於平定三藩，故對噶爾丹的挑挑豐只好忍讓。

1683 年康熙皇帝終於解決了三藩，立即開始處理喀爾喀蒙古事務。1686 年在他的建議下，噶爾丹和喀爾喀蒙古諸領袖進行了一次會議，試圖解決彼此問題，但是會談沒有成功。1686 年，清廷與沙俄簽訂了「尼布楚條約」，這和平條約不單確保了清俄邊界的和平，更讓康熙皇帝在對付厄魯特聯盟的戰事部署中再無後顧之憂。1690 年，當噶爾丹再次入侵喀爾喀蒙古的時候，康熙皇帝派出大軍，在烏蘭布通大敗噶爾丹，恢復清朝在喀爾喀蒙古中的威信。1696 年，噶爾丹一方面受到清軍的追擊，另一方面又發現其根據地準噶爾盆地已被其侄兒妄阿拉布坦乘機佔據，他進退不得，在 1697 年飲藥自盡。

但是噶爾丹的死去並未平息準噶爾部的問題，妄阿拉布坦成為準噶爾的新領袖。他在 1716 年帶入藏，佔據拉薩。清政府只好調兵入藏，1720 年，大敗準噶爾軍。雖然妄阿拉布坦死於 1727 年，其子噶爾丹策零又繼續與清為敵。噶爾丹策零在 1745 年逝世，清廷發現準噶爾部爆發權力繼承之爭，乾隆皇帝於是支持小王子阿睦爾撒納，阿睦爾撒納在清軍的支援下，控制了準噶爾部。但阿睦爾撒納隨即自稱汗，並反抗清朝，戰事延續到 1757 年清軍才將阿睦爾撒納殺死。但阿睦爾撒納雖死，厄

魯特的動亂從沒有停止。顯然，從噶爾丹開始，在整整一個世紀，準噶爾人已將對抗清朝作為一個光榮的傳統，

清廷要確保厄魯特地區的和平，便要對這地區進行有效的統治。在戰事結束的前一年，乾隆皇帝已經決定將來厄魯特聯盟仍須分為原來的四個政治力量，互不統屬，而又受清朝的保護，此舉是避免任何一派勢力坐大。到平定準噶爾後，清廷更加深化原來的構想，新征服地區分為十個「汗國」，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上，這十個汗國又細拆為 34「旗」，全隸屬於中央的理藩院。

清廷的政治技巧，還表現在其的思想形態工作上。乾隆皇帝決定將準噶爾人對抗清朝的傳統抹掉，他下令取消準噶爾作為地方或部落的名稱，在這個地區的部落，只可以「厄魯特」或「厄魯特蒙古」為名。乾隆皇此舉，無疑是將這些部落中的部民，賦予一個新的身份--蒙古人。從此，厄魯特成為與察哈爾和喀爾喀一樣的蒙古人，乾隆皇帝還為廣大的「蒙古人」制訂標準的蒙古文字，以深化他們的身份認同。

宗教上還要作出改變，準噶爾部的首領一直以西藏的黃教作其統治的思想支柱，而隨著準噶爾的東面擴展，黃教甚至開始在原本是紅教地盤的喀爾喀蒙古和察哈爾蒙古地區流傳。故此，要統治厄魯特蒙古，須先由作為厄魯特蒙古的宗教思想泉源西藏開始，而西藏的最具精神力量的喇嘛，就是達賴喇嘛。

由順治皇帝開始，清帝對達賴喇嘛一直非常禮遇，例如在 1653 年，達賴喇嘛訪問北京，順治皇帝便在首都修建第一所黃教寺廟—黃寺，作為達賴及其隨從的臨時居所；順治皇帝又出資重修和擴大達賴在拉薩的布達拉宮。自順治至乾隆四朝間，朝廷在北京共建有包括雍和宮在內的 32 座黃教寺廟。除了建築寺廟外，清皇帝還資助大量的佛經編修和翻譯，使北京打造成藏傳佛教的中心。這些舉動，除了個人信仰喜好外，也體現了清朝在爭取達賴喇嘛在政治上作出支持的決心。乾隆皇帝認為單單禮遇達賴是不足夠的，喇嘛的影響力實在太大了，萬一他與蒙古地區的地方軍事勢力結合，便形成反對清朝統治的龐大力量。

乾隆皇帝要建立一套制度，使到達賴和其他西藏喇嘛均置於王朝的控制之下。他除了規定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不可在西藏以外地區找尋，以避免強大的蒙古貴族成為達賴喇嘛外，又自 1792 年開始，規定西藏的所有轉世靈童均必須以「金瓶掣籤」的辦法來確定，並由駐藏大臣陪同坐床儀式，才能正式成為活佛，此舉無疑使到達賴喇嘛的繼承須首先得到清政府的首肯。除此之外，乾隆皇帝更將自己的形像塑造成交殊菩薩的轉生。這個形像的塑造，使乾隆變成佛教的神和人間統治者的結合，即使沒有達賴喇嘛，他也可在西藏和蒙古地區具有神聖的權威。1758 年，剛值清朝

平定了準噶爾，乾隆皇帝命人在河北承德避暑山莊的東北部，仿西藏著名佛寺桑耶寺，建成普寧寺，作為他日後接見厄魯特蒙古領袖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皇帝特諭將繪有他作文殊菩薩樣的唐卡懸掛在寺內，此舉無疑是表示在接見厄魯特領袖的時候，乾隆皇是以文殊菩薩的身份。

總括來說，到乾隆皇帝時代，清朝皇帝透過宗教，已建立起一套統治今日內蒙、外蒙、西藏、新疆的有效辦法：以「轉輪聖王」的身份去統治紅教地區；又以文殊菩薩的身份去統治黃教地區。

本文參考：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可同時參考張瑞威的書評，載《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一卷第一期(2003.4)，頁 173-6。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延伸閱讀：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 (1967): 189-95.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1996): 829-850.

何炳棣著，張勉勵譯，〈捍衛漢化：駁伊芙琳·羅斯基之「再觀清代」〉，《清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頁 113-120；第三期，頁 101-110。

Pamela K. Crossley, "Making Mongols," in Pamela K.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d.),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58-82.

Karl A. Wittfogel 著；蘇國良譯，〈中國遼代社會史(907-1125) 總述〉，收入鄭欽仁、李明仁編譯，《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2002年，頁 1-69。

王輔仁、陳慶英，《蒙藏民族關係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王俊中，《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頁 80-162。